

網絡時代自我與他者的對抗與對話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新冠疫情爆發的這段日子，給我們生活帶來的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出去的時間變少了，在家的時間變多了；與其他人直接的交往變少了，在網上的時間變多了。孩子們在網上聽課，教師們在網上授課，公司裏在「雲端」開會，主婦們通過網絡購買可以送上門的日用品，老人們沉浸在手機裏傳來的各種視頻……每個人都可以在信息極大豐富的網絡世界中自由翱翔，並得到盡可能的滿足。

網絡中的自我與他者

在網絡的空間裏，我們的靈魂仿佛置身於更加廣闊的量子世界，不僅超越時空與古今中外的精神相往來，也超越性別、種族、階級地與另外某個靈魂發生莫名其妙的量子糾纏。簡單地說，當面對各種各樣的信息大爆炸的衝擊時，如疫情爆發、蝗蟲蔓延、洪水泛濫、地震威脅、中美糾葛……內心的恐懼、人心的震動，會在網絡空間引發許多的共鳴或爭執：在某個角落中蝸居的我們可能與某個不知身在何處「他者」惺惺相惜，而曾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同學、朋友、親人們，大家卻可能在網絡中爭吵不休，不僅互噴、拉黑、退群，甚至還有舉報……我們的家庭、社會陷入衝突與撕裂、仇恨與傷害，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碎片化。為什麼在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裏，網絡如此開放發達，信息如此豐富多元，我們不僅沒有因此變得開放包容，反而如此封閉：不僅為我們自己營造了一個同質、同一、貌似自洽和諧的世界，也給自己製造了一個異質、邪惡、不可理喻的「他者」？

網絡中自我與他者的對立

「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雖然由來有自，但網絡上「自我」與「他者」的割裂與敵對卻是前所

未有。從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就開啟了主客分立的思維模式。到了近代，這種思維模式變得越發精緻。例如：（1）強調人的主體性。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個體的主體性得到高揚，更加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自我決定」。（2）強調理性的作用。傳統形而上學視理性為人的本質。康德主張理性為自然立法，把理性當作法庭，一切事物都要經過「理性」這個法庭決定其存在與否。對主體的高揚，對理性的確信，不僅挺立了人在天地萬物中的主體性，以征服自然、宰製客體，也加劇了主客二元的思維誤用，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了「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衝突。

對「自我」與「他者」對立的產生以及解決之道，西方的哲人們早有洞見。馬丁·布伯在其名著《我與你》中開卷便挑明了人生的二重性：「我—你」人生與「我—它」人生。當人處於「我—它」的人生境界時，世界上其他的生靈萬物，都是與我相對立的客體，是滿足我的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當人處於「我—你」的人生境界時，「你」不再是與「我」相分離的對象。「我」不再是一經驗物、利用物的主體，「你」也不再是時空世界之一物，而是統攝萬有的世界，「我」以我的全部生命與「你」相遇，「我」的整個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絢爛光華中。^[1]今天，如果我們一心想著「一切以『我』的利益為先」，或者「雙贏，就是『我』贏兩次」，「自我」與「他者」便永遠處於對立當中。

在當今的網絡時代，自我的主體性借助網絡的無所不在得到了更大的拓展，信息的無限豐富使得人對自己的理性更加自信，對於這種網絡上「自我」與「他者」割裂與敵對的現象，似乎馬丁·布伯也早有先知般的預見。如果不能確立「他者」的主

體性，「自我」即使通過超越達成與世界的融合，也不足以解決「自我」與「他者」對立，反倒更加深其敵對狀態。個體與世界的融合有兩種，其一是讓個體通過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無限過程來獲得自我超越；其二是用至大無外的「我」來吞沒宇宙及「他者」。^[2]在網絡時代，這種個體的「自失」與「自聖」，不僅無助於消解「自我」與「他者」的對立，反而因為神奇的網絡而變得更加誇張、更加荒謬：當日益膨脹的主體在更加自信的理性作用下，「自我」不再需要古典聖賢的修養工夫，就能迅速完成修齊治平的不朽功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成了每個網民自承的天命。面對各種社會危機、人道災難、國際糾紛等事件，替天行道的網民挺身而出，以普天之下舍我其誰的豪邁情懷，慷慨激昂地指點江山、臧否人物。與此同步的是，大數據高居「雲端」俯瞰著「我」的網絡蹤跡，精準地推送符合我趣味格調的新聞、評論，信息雲成為了「我」最知心的朋友。在與這個朋友的互動中，整個世界的思想、信念、觀點、趣味，越來越與我同步，網絡世界為「我」在「我」之外造了一個「大我」。「大我」不僅在智性上近乎無所不知，在網絡上也近乎無所不在，「大我」凌駕於大地之上，俯瞰著凡塵中的芸芸眾生。不同的「大我」之爭，不再是就事論事，而是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之爭，關乎君臣大義、家國情仇、正邪之辯。爭執一旦展開，「他」與「我」的差異就會裹挾著無盡的信息雲，在網絡世界中形成混合著古往今來、前生後世、思想與現實諸國度的世界大戰。「大我」之爭之上，可能還有擁有巨大資本的網絡公司、掌握話語權的國家機器、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卡里斯馬式的各種大咖、明星的介入，他們猶如奧林匹克諸神一樣，影響著信息雲的流動，操縱甚至製造著各種話題，拋售著各種觀念，引導著各種潮流，使得「我」與「他」的楚河漢界愈發壁壘森嚴、「我」與「他」衝突更加陷入混沌，形成近乎靈異的量子糾纏。

網絡中自我與他者的對話

為了尋求「自我」和「他者」的和解，東西方的哲人們均訴諸於哲學之上的神聖維度。布伯認為，蔽於主客體二元對立的種種學說皆滯留在表面世界，惟有「關係」能把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

「關係」實現於「我」與「你」之間，「不斷延伸的關係之線在『永恆之你』中欣然相結」。^[3]即使作為「永恆的你」可以包容「我」，但「你」還是「你」，「我」還是「我」，二者的關係不可消解合一。二者皆以自己的語言稱述「你」，這才有了「我」與「你」，才有了對話，有了精神，有了作為精神本原活動的語言，有了永遠不滅的「道」。^[4]列維納斯也有類似的洞見，他認為，只有「他者」才能超越自我中心，而突破自我論的本體論。在其「他者哲學」中，「無限的他者」為迥異於「我」的「他者」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我」必須接納一個迥異於我的「他者」。「無限的他者」是他者，人為他者擔責也是為「無限的他者」擔責。^[5]與「他者」的對話是我的天命之責。在沈清松看來，在當前多元文化彼此頻繁互動的形勢下，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利益、意識形態與世界觀的衝突，多元他者之間的對話必不可少。只有在面對終極實在、無限的他者、永恆的你時，向「他者」開放，自我才可能從封閉的、獨斷的、被操縱的、碎片化的網絡世界中被拯救出來。

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時代裏，個體的生命需要神聖的帷幕來遮蓋，孤獨的自我需要向終極實在敞開，有限的人謙卑地降服在永恆仁愛本體面前，我們才可能謙虛地與「他者」展開對話，將「他者」友善地視為自我的一部分，將自我視為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保羅·利科）。這樣，在一個不幸、災難、痛苦尚存的世界裏，我們才有可能得到安慰、得到憐恤、得享和平、得見真理，甚至為維護「他者」的公平公義而樂於遭受逼迫。因為，虛心的人是有福的……

[1]參陳維綱：「馬丁·布伯和《我與你》——中譯者序」，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6頁。

[2]同上，第7-8頁。

[3]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69頁。

[4]同上，第75，86頁。

[5]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Pittsburgh, 1969, p211.

作者簡介：韓思藝，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教授。